

·珍藏撷英·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

杨秀清 (敦煌研究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 20 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开启,是人类文明史的重大发现。文章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介绍了藏经洞文献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以期使普通大众对藏经洞文献有一个基本了解。

关键词: 敦煌文献

中图分类号: G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6)03-0121-03

The Encyclopedic Dunhuang Documents

Yang Xiuqing (Dunhuang Academic Institute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The hidden library Cave of Mogao Grottoes at Dunhuang was discovered in 1900.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for human civiliz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Based on the rich achievements in academic study of the Dunhuang Knowledge,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giving a wholeness view of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Library Cave and the great documentation value of them, and hoping that this introduction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will lead to a well-understanding for people who are interesting in Dunhuang Study.

Key words: Dunhuang documents

CLC number: G251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6)03-0121-03

藏经洞文献(以下称“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明清大库档案,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考古发现。而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可谓字字珠玑,片片珍贵。(图一 见封三)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图二 见封三)目前可以确切判定为藏经洞出土的标有纪年的最早写经为英国图书馆收藏的S.79《十诵比丘戒本》,其题记中有“建初元年岁在乙巳十二月五日戌时,双丘德佑于敦煌城

南受具戒”字样,建初为李嗣所建西凉年号,建初元年为公元406年。这也是敦煌文献的最早纪年。敦煌文献中的佛教经典,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敦煌文献保存了许多反映初期禅宗思想的语录,特别是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对于研究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另外,记载南北禅宗辩论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也是初期禅宗历史上的要籍。反映北宗灯史的杜骞《传法宝记》和净觉《楞伽师资记》,提供了北宗的传法世系和不同的说法,特别是8世纪上半叶北宗兴盛的情况。《历代法宝记》(约774年成书),是记载剑南地区的

保唐宗(净众宗)历史的重要禅籍。这些禅宗灯史的发现,比宋元以后流行的道原《景德传灯录》(11世纪初)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早期禅宗的历史,填补了禅宗思想史的重要篇章。

三阶教是六世纪后半期魏州信行(540~594)禅师宣扬的一个佛教宗派。三阶教的“三阶”认为佛灭后初500年是正法时期,人生活在净土世界;其后500年是像法时期,人们处于五浊诸恶世界,人是凡圣混杂,流行大小乘(三乘)佛法;佛灭1000年后,是末法时期,人们也处于五浊诸恶世界,但人都是“邪解邪行”。信行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末法时期,当信奉“三阶教”,普信“一切佛乘及三乘法”,要以施舍、礼忏、苦行来求得解脱。由于三阶教否定现实的说教引起统治者的恐慌,隋唐时期多次遭到禁止,宋代以后湮没不闻。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吐蕃时期一份敦煌龙兴寺的藏经目录上,就登记有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阶佛法发愿法》,它的发现,使历史上这一已消失的宗教派别得以复原,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佛教文献中还有不少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佛经)。唐末五代以来,我国各地寺院逐渐以《开元录·入藏录》所著录的1076部5048卷佛典为大藏的标准数目,并以此组织本地大藏,而一些《开元录·入藏录》未著录的佛典便被排除在外。藏经洞发现的藏外佚经,除上述有关禅籍、三阶教经典外,还有中唐以后新译的经论和编纂的经疏,包括吐蕃时期在敦煌的高僧昙旷和法成的译著等。敦煌藏外佚经发现后,立即引起了佛学研究者的极大关注。1910年清学部将有关敦煌文献移交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后,我国佛学专家李翊灼先生就从中分辨出159种古佚佛典,编成《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1924—1928年,日本佛教界在编纂《大正新修大藏经》时,除了把有关敦煌佚经编入相关部类外还特别用第85卷《古逸部·疑似部》,校订了188种敦煌古佚佛经。这些藏外佚经的发现,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许多被佛教界认为真伪未判的经典(“疑经”)和被认为是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即所谓“伪经”,这些疑伪经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敦煌文献中的梵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及与汉文对照的佛经,对摸索清汉

译佛经的来源以及考证佛经原文意义作用很大。敦煌文献中各类佛经的目录也不少。此外,敦煌佛经,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写经,由于校勘精良,讹误较少,对校勘唐以后的印本佛典也大有裨益。

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寺院文书,其包括寺院财产账目、僧尼名籍、事务公文、法事记录以及施入疏、斋文、愿文、燃灯文、临圻文等,是研究敦煌地区佛教社会生活不可多得的材料。

敦煌是古代佛教圣地,道教的发展远不如佛教。但在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推崇老子,道老学说度兴盛起来,因而在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为数不少的道教典籍。《老子道德经》是道教的根本经典之一,敦煌文献中不仅有大量抄本,而且还发现了6种注疏,其中《老子想尔注》(图三见封三)和成英玄《义疏》是《道藏》中未收入的佚书。特别是《老子想尔注》,反映了早期道教思想,十分珍贵。敦煌本《升玄内教经》和《太一本际经》也是今本《道藏》失收的道教经典,特别是《太一本际经》在唐前期影响很大,也是写本最多的敦煌道教文献。其它如道教佚经《老子化胡经》、《无上秘要目录》及唐残抄本、《天平经目录》都是研究道教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敦煌文献中的道教经卷约有500号左右,主要为初唐至盛唐的写本。而纸质优良、书法工整、品式考究则是敦煌道教文献的一大特色。

除佛教、道教文献外,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有关摩尼教、景教的经典,为我们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历史证据。唐代,除了佛教、道教作为主流宗教外,在开放的背景下,产生并流行于西方地区的三种宗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也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敦煌文献中没有祆教经典保存下来,但是关于祆教在敦煌活动的记载却不少。唐前期敦煌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一处信仰祆教的粟特人聚落,位置在敦煌城东一里处的安城。敦煌文献中有一件歌咏敦煌名胜古迹的《敦煌廿咏》,其中有一首《安城祆咏》,透露出祆教在敦煌流传的信息。敦煌归义军官府的支出账中,常常有“赛祆”的记载,说明晚唐五代时期,祆教仍在敦煌流行,并被纳入传统的中国祭祀活动中,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一个宗教。中世纪,摩尼教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影响很大。敦煌发现的汉译摩尼教经典《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是研究摩尼教思想及其在中国流传情况的

重要文献。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利派),在唐朝太宗时期,聂斯脱利派传教士就把基督教传入中国。但在17世纪前,人们并不知道这一史实。直到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在西安西郊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人们才知道聂斯脱利派传教士确实在太宗贞观九年(635)来到中国。此碑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建立的,它是景教传入中国的有力物证。但由于景教文献很少,人们难以对其在中国流传的情况作出全面系统的判断。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了有关唐朝景教的文献,丰富了景教研究的内容。如《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尊经》,就是研究景教仪式和教法的重要资料。(图四见封三)

敦煌文献中的历史、地理著作,公私文书等,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的第一手资料。以史籍而言,敦煌文献中除保存了部分现存史书的古书残卷外,还保存了不少已佚古史书,这些史籍不仅可补充历史记载的不足,而且可订正传世典籍记载的讹误。敦煌文献中的一批地理著作,也十分引人注目,这些已亡佚的古地志残卷,是研究唐代地理的重要资料。敦煌文献中还有关于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地区的几种方志,更为史籍所不载,如《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寿昌县地境》、《沙州地志》等,对敦煌乃至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意义重大,每一件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图五见封三)

比如,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历史,是归义军政权统治敦煌的历史。关于这段历史,在两《唐书》、《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及《宋史》等正史中记载都极为简略,且错误很多,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情况只能零星地了解。而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在上百种以上,多年来,学者们根据这些资料,基本上搞清了这段历史,从而使这段历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千载坠史终被填补。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大量中古时期的公私文书,这些未加任何雕琢的公私文书,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公私文书,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完全保存了原貌,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研究中古历史至关重要。(图六见封三)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古典文学资料更引人注目。它包括《诗经》、《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以及诗、歌辞、变文、小说、俗赋等,文学作品除文人作品和某些专集、选集的残卷外,大多都是民间文学作品。

敦煌文献中的儒家经典,最具学术价值的是对今本儒学典籍的校勘价值。其中《古文尚书》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最古版本,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著《论语郑氏注》,更是失而复得的可贵资料,郑玄注《毛诗古训传》,南朝徐邈《毛诗音》则最为诗经研究者所重视。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诗歌数量很多,其中尤以唐五代时期为最多,大致包括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敦煌本地诗人之作、释门佛徒之作、敦煌民间诗歌几个方面。敦煌保存的唐代诗人之作,最著名的是韦庄的《秦妇吟》和《王梵志诗》。敦煌歌辞,过去一般称为曲子词,除少数文人作品外,大多来自民间,作者几乎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这些歌辞中,值得一说的是《云谣集杂曲子》的发现,这个集子编选了30首作品,从时间上看,明显早于传世的《花间集》、《尊前集》,为研究词的起源、形式及内容,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作者的广泛性使敦煌歌辞得它的题材内容丰富多样,艺术风格多姿多彩。另外,一些民间小唱如《五更传》、《十二月》、《十二月》、《百岁篇》、《十恩德》等,也属于敦煌歌辞这一范畴。变文是敦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所谓变文,是一种韵文和散文混合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体裁。变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过去竟不为世人所知,幸赖敦煌变文的发现,才使这一问题水落石出,从而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图七见封三)敦煌文献中的话本小说主要有《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韩擒虎话本》、《庐山远公话》等,为后世白话小说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敦煌俗赋有《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丑妇赋》等,是古代辞赋通俗化的产物,和文人赋有明显的区别。此外,在讲经文、因缘文、押座文、佛赞、偈颂等文体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文学性很强的佳作。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重要孤语言学数据,如《玉篇》、《切韵》、《一切经音义》、《毛诗音》、《楚辞音》、《正名要录》、《字宝》、《俗务要名林》等。

敦煌文献中的科技史料,则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支奇葩。科技资料主要有数学、天文学、医药学、造纸术和印刷术等方面的内容。数学方面有《九九乘法歌》、《算经》、《立成算经》等,这些都是中国现存算术中最早的写本,是中国数学史的重要史料。如P.2667是一部算学书籍的抄本,其中保存有“营造部第七”的子目和另外两个残失名称的子目,共存13题,算题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建筑、制造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不仅是研究数学(下转第134页)

《茶书》、《石鼎联句》,而与现在正式通用的《茶书七种》七卷相比较,可以说是比较贴切的。

目前,该书在书名上混乱,虽然可以重新商讨,但是由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用《茶书七种》七卷之名已经正式运用较久,影响范围较大,所以书名不妨仍然继续沿用。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茶书总目提要》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尚不一致,需要进一步加以统一。本文谨将查考的有关情况和初浅的看法提出来,以供今后有关单位或个人在藏书、引用、出版时参考。

参考文献:

-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 中国农业古籍目录[Z].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116.

[2] 万国鼎. 茶书总目提要[J]. 农业遗产研究集刊·二集, 中华书局, 1958:205-239.

[3]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474-475.

[4] 阳海清. 中国丛书广录·下册[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9:1036-1037.

[5] 朱自振. 明清茶书综述[J]. 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 2004, (24):1-17.

作者简介:章传政(1971-)男,南京农业大学茶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茶叶经济、文化、历史研究;黎星辉(1962-)男,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自振(1934-)男,南京农业大学教授,茶史专家。

(上接第123页)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其它方面的参考文献。天文学方面,有《二十八宿次位经》和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经《全天星图》、《紫薇垣星图》等,它表明中国天文学在当时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也为中国天文学和天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古代,天文和历法是密不可分的,敦煌历日大部分是由敦煌自己编制的,其中《宋雍熙三年(986)丙戌岁具注历日并序》已引用了七曜日(即今之星期)注记法。(图八见封三)医学类文献,目前所知至少在60卷以上,如果再加上佛经中的医学内容,则有近百卷,大致可分为医经、针灸、本草、医方四类。这些医书不仅为传世医书的校勘提供了较早的版本,同时由于这些医籍中保存了一些久已失传的诊法、方药,提供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内容,不仅对医学研究有意义,而且在今日临床医学中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公元4—11世纪连续不断的纸张样本,是研究造纸术的活材料。敦煌文献的装帧形式,有卷轴装、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折页本、册子本等,是我们研究印刷史的实物材料。敦煌文献中的唐咸通九年(86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也是中国发明印刷术的实证。敦煌文献中的写本,实际上是中古书法史的缩影,对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意义自不待言。

敦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等,对研究西北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如

藏经洞发现了数千件古藏文写本,除佛经外,有不少吐蕃典籍、文学作品、世俗文书,为我们研究吐蕃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史料。古藏文写本《吐蕃王朝编年史》、《吐蕃王朝大事记》、《小邦邦伯与家臣名表》、《吐蕃赞普世系表》,是研究吐蕃历史的珍贵文献。唐朝史籍中,除记载吐蕃攻占敦煌的史实外,对吐蕃统治下的敦煌情况,没有太多记载,而敦煌文献中的古藏文文书和汉文文书,却为我们研究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甚至吐蕃统治河西、西域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又如,利用敦煌文献中的回鹘文、于阗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可以搞清历史上甘州回鹘和于阗王朝的有关历史。对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粟特民族,敦煌文献提供的证据,则更为重要。

敦煌文献还保存了一些音乐、舞蹈数据,如琴谱、乐谱、曲谱、舞谱等,这不仅使我们能够恢复古代音乐舞蹈的本来面目,而且将进一步推动音乐史、舞蹈史的研究。

尽管藏经洞文物流散于世界各地,但它丰富的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20世纪形成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放异彩。敦煌文物所映射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者简介:杨秀清(1963-)男,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隋唐史研究。